

主編 廣州圖書館 箋注 丁玲 林銳

GUANGDO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廣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張之洞致張佩綸未刊書札



張之洞致張佩綸未刊書札

主編：廣州圖書館

箋注：丁玲 林銳

編委：方家忠 羅小紅 蔡曉絢 付躍安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張之洞致張佩綸未刊書札 / 廣州圖書館主編；丁玲，
林銳箋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1
ISBN 978-7-5495-1145-7

I．張… II．①廣…②丁…③林… III．張之洞
(1837~1909) —書信集 IV．K827=5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276083 號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廣西桂林市中華路 22 號 郵政編碼：541001
網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桂林廣太印務有限責任公司印刷

（廣西桂林市臨桂縣金山路 168 號 郵政編碼：541100）

開本：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張：9.5 字數：180 千字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68.00 元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印刷廠聯繫調換。

前言

林銳

北望鄉關海七昏，大招何日入修門？殯宮春盡棠梨謝，華屋山邱總淚痕。

廿年奇氣伏孤蘆，虎豹當關氣勢粗。知有衛公精爽在，可能示夢傲令狐。

這是張佩綸逝後一年，其好友張之洞在金陵所作《過張繩庵宅四首》中的兩首，對已逝故友的傷悼之情，躍然紙上。

作為中國近代工業史、思想史和教育史上的重要人物，張之洞長期以來都是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對象。而張佩綸作為著名作家張愛玲的祖父，不但一般人對其知之甚少，就連張愛玲本人也對他缺乏基本的瞭解，從而在世人面前蒙上一層神秘的面紗。

張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字孝達，又字香濤，號廣雅、壺公、無競居士，晚號抱冰，直隸（今河北）南皮人，清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八月初三生於貴州。同治二年（一八六三）進士，授編修。後曾歷任湖北學政、四川學政、翰林院侍講學士、內閣學士等職，光緒七年（一八八一）授山西巡撫。十年四月署理兩廣總督（七月實授）。在中法戰爭中起用老將馮子材，收編劉永福黑旗軍，擊敗法軍，收復鎮南關、諒山。十五年調補湖廣總督。甲午戰爭期間及光緒二十八年曾兩度署理兩江總督。三十三年授大學士、軍機大臣，兼管學部。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八月二十一日逝世，謚「文襄」。張之洞為晚期洋務運動首腦之一。他在兩廣任上已經非常重視並着手興辦實業，在湖廣任內更是大辦洋務，先後開辦漢陽煉鐵廠、湖北槍炮廠、馬鞍山煤礦、湖北織布局、湖北紡紗局等大型近代企業，修建蘆漢鐵路，籌建粵漢鐵路，提倡新式教育，編練新軍等等，對中國近代化進程影響巨大。他又是著名的學者、教育家和思想家。一生興學育才，先後奏設尊經書院、廣東水師學堂、廣雅書院，創辦兩湖書院以及各種近代學堂；在學術上主張「中學為體，西

學為用」，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影響深遠。著有《書目答問》、《勸學篇》、《輶軒語》、《廣雅堂集》等，後人彙編有《張文襄公全集》、《張之洞全集》等。

張佩綸（一八四八—一九〇三），字幼樵，又字繩庵，號蕢齋，直隸（今河北）豐潤人，生於杭州。清同治十年（一八七一）進士。光緒元年（一八七五）以編修擢侍講，署日講起居注官。光緒八年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中法戰爭初起，主戰。旋受命會辦福建海疆事宜，兼署船政大臣。光緒十年，在馬江之役中戰敗，福建水師覆滅，馬尾船廠被毀，遂於次年被褫職遣戍察哈爾。三年後期滿釋還，入李鴻章幕，並娶其小女經璫（鞠耦）為繼室；光緒二十年遭彈劾，遂遷居金陵。庚子年八國聯軍入侵，曾奉命入京，協助李鴻章辦理議和事宜，但因與李意見相左而稱病南還，終老金陵。其學問淵博，才思敏捷，下筆數千言一揮而就，著有《濶于集》、《濶于日記》、《管子學》等。

二張訂交，當於同治末年兩人同在翰林院之時。到了光緒初年，兩人在政治上一同成為「清流」的幹將，且有同鄉之誼，故私交甚篤。所謂「清流」，是指當時一班標榜風節、不畏權貴、敢於指陳時政的言官詞臣，他們屢屢上書言事，不惜犯顏直諫。對外主張維護國權，力禦外侮，對內則主張改革弊端，整肅吏治。他們聲氣相應，雖無實際組織而頗能左右朝中輿論。但囿於歷史認識，難免時常發迂腐之論，甚至有逆潮流而動之聯繫。其產生的背景與當時慈禧利用其制衡恭親王奕訢和以湘、淮系重臣為主的地方派系有關。張之洞在光緒五年七月的《直言不宜抑摺》對當時的情形頗為頌揚：「方今時事多艱，兩宮皇太后、皇上宵旰憂勤，勵精振作，敬天愛民，從諫如流。近年來，言事諸臣漸改從前嬖孽容默之積習，朝野中外同聲稱頌……」陳寶琛之子陳懋復也稱：「景廟初年，兩宮勵精圖治，恭忠親王、高陽李文正公輔政。先君與宗室侍郎寶廷、豐潤張學士佩綸、南皮張文襄公奮發言事，慨然有澄清之志。天下想望其風采，號為清流。」（陳懋復等撰《陳寶琛行述》）因「清流」與「青牛」諧音，時人稱之為「青牛黨」，並謔稱其領袖人物李鴻藻為「青牛頭」，陳寶琛為青牛尾，寶廷為青牛鞭，王懿榮為青牛肚，其餘牛皮、牛毛甚多；二張則為「青牛角」，用以觸人（劉成禺《世載堂雜憶》「龍樹寺觴詠大會」條）。清流有南北及先後之分。前期為北清流，以李鴻藻為核心，其成員以北方人居多。光緒十年中法戰爭期間，李鴻藻因「甲申易樞」事件失勢，而張佩綸等又離開京城，北清流由此解體。隨後以潘祖蔭、翁同龢為核心的南清流繼起，其成員以南方人為主。後因戊戌變法前翁同龢被譴南還而解散。北清流的主要成員有「清流四諫」，後人對其具體名單的記載略有出入，計有二張、黃體芳、寶廷、陳寶琛等，但二張之名卻總是名列其中。二張在「清流」中的地位和作用顯然可見。兩人曾多次合作上疏縱論天下大事，其典型事件是崇厚與俄羅斯擅議新約事，二張一直和陳寶琛合作，多次上疏陳言。崇厚最終被定罪，改派曾紀澤前往談判，以

二張為主的清流黨人所施加的壓力顯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可居室主人王貴忱先生向來推重張南皮的學問、功業，故收藏其著作、墨蹟及相關文獻甚多。其中比較重要的有一批南皮致繩庵的手札及詩稿，均未見《張文襄公全集》及河北版、湖北版《張之洞全集》著錄，彌足珍貴。

該批手跡共計信札六十二通，另有詩稿兩頁，現裝為四冊，其前後排序與實際書寫時間略有出入。後附無款題記一開：「廣雅都門辰已來簡，己卯年亦附詩在內。」審其語氣，當為受信人所寫；而其用筆、結體等方面均與張佩綸的《澗于日記》以及其他具名手札特徵一致，為繩庵親筆無疑。辰、巳為庚辰、辛巳之省稱，即光緒六年（一八八〇）、七年（一八八一）。據此，可知此批信札為清流時期二張交往的重要物證，見證了他們之間的親密交誼。在苑書義等人主編的《張之洞全集》中，收錄有張之洞在光緒五年至十年初致張佩綸的信札共廿四通，其中南皮出任督撫之前所寫者僅有論書札四通。這四通係香濤門下王秉恩手錄，後交由趙尊嶽以《張文襄公論書語》之名刊行（見趙尊嶽《張文襄公論書語跋》），係其於光緒五年冬在京時與繩庵討論書法的信札。可居室所藏這一時期南皮致繩庵信札則達六十餘通，可補《全集》之闕。僅此已足見此批手札的重要性。

一

該批書札的年代，據前述張繩庵的題記，當作於光緒六、七年間。除繩庵題記之外，尚有數事可資進一步考察其具體的書寫時間。

諸札中，有數通在署名之前加「期」字者。「期」係「期服」之簡稱，為喪服制度之一。清代喪服制度沿前代舊制，「期服」分「齊衰杖期」和「齊衰不杖期」兩種。而光緒六七年間的張之洞應是為妻子服「齊衰杖期」。按：香濤的第一任夫人為貴州都勻知府石煦之女，同治四年五月病卒。同治九年繼娶湖北按察使唐樹義之女，兩年後唐氏夫人卒。第三任夫人為龍安知府王祖源之女，亦即其好友、著名金石學家王懿榮之妹。兩人於光緒二年冬結婚。光緒五年，王氏夫人下世。

王氏夫人去世的具體時間，許同莘《張文襄公年譜》繫諸是年二月，後人也多宗此說。但張佩綸卻另有說法。《澗于日記》記載，己卯年（一八七九）四月初六日，繩庵生母毛太恭人去世，百日之後扶靈回原籍安葬。九月二十八日甫抵北京，「聞香濤繼室亦以婉逝，走慰之」。其去世當在此前數日之內。日記中尚有相關的記載：十一月初三日「晨起，往奠張孝達繼室王恭人於龍樹寺」；至十一月十五日，「夜至龍樹寺，詣孝達，談其夫人盡七也」。十一月十五日上距九月二十八日，正好接近盡七之期。日記所記去世時間和原因較為明確，而《年譜》則是「詳於撫晉以後，先乎此者不得而詳」（許同莘《張文襄年譜序》），故似當以日記為準。因此，這些帶

有「期」字的信札當為己卯年九月下旬之後一年內所寫，其中，署「除日」的第四通，其署名前既有「期」字，則可明確其日期為己卯年除夕。

編纂《畿輔先哲錄》事。第五札：「請過寒齋，同《畿輔先賢錄》。專候專候。敬上幼樵仁兄。期之洞頓首。廿日辰刻。」按，《畿輔先賢錄》當係《澗于日記》中所提到的《畿輔先哲錄》，其編纂時間為己卯年（一八七九）。日記是年「十一月十九日」條記：「蔡輔臣約談論八弟驗看事。午後王夔石來。夜詣旭莊。孝達來約，遂去，因欲輯《畿輔先哲錄》也。」次日：「晨起過孝達，輯先哲錄。午後歸，寫墓志清稿一通。」此處所記與孝達廿日札所言之事相符，可知此札作於是日。

第二十八札談到「批改兒子文字，精密無比」，這當是孝達命兩子從繩庵游後之事。《澗于日記》庚辰二月初一日載：「孝達前輩命其子權及頤從余遊。頤郎甫十二歲，余愛之，前輩因並命長嗣執業。抗顏為師，殊自愧赧耳。」此札當為其後所寫，又因落款前不帶「期」字，故很可能遲至是年九月之後。

諸札中，有並致繩庵之兄「守一」者。查《澗于日記》，未有任何繩庵與兄長同過孝達家或同遊廠肆的記錄。但日記中多處提到其四兄。如戊寅年十月二十一日：「得四兄書，即作復。箋寄清湖。」己卯年，張佩綸連遭大故。四月初六日，繩庵生妣毛太恭人去世；五月五日其夫人也下世；七月五日女兒殤。其四兄、九弟自浙江到京奔喪。七月二十日扶靈南下。二十三日過津沽謁見李鴻章，次日李來答拜，「並委四兄充津捐局紳士，月領三十六金」。而其大兄、二兄早卒（己卯年八月初九日記：「容舫出二兄遺著。」初十日記：「午後至蓮溪，謁大兄及諸兄弟弟靈。」），這期間其日記中未提及三兄。因此，此守一當為其四兄。上海圖書館藏《李鴻章致張佩綸書札》中，光緒五年李鴻章曾連續四信談到其兄的職位問題。至光緒七年四月，守一卧病，李多次致函慰問，並介紹西醫為之診治。六月二十四日函：「頃奉廿二日惠書，驚悉守一世弟遽歸道山」；又六月二十八日函有「守一過從既久」之語，亦可證明守一確係佩綸四兄。又據李鴻章為張父所作《原任安徽按察使張君墓表》，繩庵兄弟六人，長于佩綸者兩人：佩經，浙江知縣；佩統，監生。繩庵在《致李肅毅師相》一函中又有云：「胞兄佩經承夫子一言，鑛局移請……」綜合上引的有關文獻來看，「守一」應該就是佩經。

廣雅致幼樵、守一諸札，落款均不加「期」字。其時間很可能在兩個時段：光緒五年四月到七月之間，即守一到京奔喪期間，或者次年九月王氏夫人去世周年之後。至遲不過七年四月初，因其時守一已病重，不可能屢次出遊，而孝達在信中竟毫無問候之意。又因繩庵兄弟在母喪百日之內似乎也不適宜經常如此聚會、遊玩，故以後一時間段較為可靠。這也可從此批信札的內容中得到佐證。如第廿四札有「午後擬奉同賢昆仲到斜街花局一覽，便過先哲祠小憩」之語，則應是鄉祠落成後之事。據《年譜》考證，鄉祠落成時間在光緒六

年夏秋之間，可證此推斷不謬。

信札後附詩兩頁，各書七言詩一首，分別為《歲除日對雪，幼樵侍講、安圃編修來過小飲》和《恪靖疏論西餉，聞廷議已如所請》。安圃即繩庵之侄張人駿（1846—1927），字千里，安圃，號健庵。同治七年進士，散館授編修。歷官至兩廣總督、兩江總督。三人的這次小飲《潤于日記》也有記載：戊寅十二月二十九日，「同安圃過孝達，削鹿脯下酒，得高麗使者書（名趙同熙，字東石，官內翰直殿）。薄莫歸。」《潤于集》詩卷二也有《歲除日同健庵過孝達齋中對雪小飲》兩首記此事，中有「人海莫傳星聚處，冷齋真到雪深時。鬚眉入鏡成高格，筍脯圍爐稱小詩」、「鄉人序飲忘賓主，海客傳書值歲朝。畿甸入春花似粟，山河感舊酒如潮」諸句，三者可互相印證、補充。其事在戊寅年除夕，成詩或稍遲，故繩庵題記所言的己卯年應可信。

如前所述，張之洞致張佩綸的這批書札的年代，確係張之洞「都門時」所寫，但其時間跨度較長，並不僅限于繩庵所追記的辰巳兩年，還應包括之前的一段時間。

二

此批手札所用箋紙都較為考究，多印有精美圖畫。其中部分為京城廠肆所製賣者，如松竹齋製箋、玉采齋製箋以及多款五雲箋等，都是當年京官們寫信時經常使用的。其中的松竹齋製箋似乎名氣甚大，現在所見不少晚清京官的稿、抄本均使用一種版心下方印有「松竹齋」字樣的紅格稿紙。此外，也不乏香濤自製之箋，如「無競堂」箋、「匏箋」，兩者上面所印製的題字皆為其手跡。

而最值得留意的則是其中的十開「黃石素書」箋。箋上印一洞石，石之右上側印有「黃石素書」字樣，左下方則有「樵士」朱文印。其中第十七札的上款恰好亦作「樵士」，另有第三十一札上款為「樵公」。由此可見，「樵士」為繩庵未見記載之別號，「黃石素書」箋則是繩庵的一種自製箋紙。諸札中尚有「韻公」、「嘉禾鄉先生」（繩庵光緒六年二月至八月日記名為《嘉禾鄉人日記》）、「黃石先生」等稱呼也都罕見他人提及。這些箋紙由繩庵贈送香濤使用。無獨有偶，在第五十六札中，香濤則以本人的自製箋紙贈予繩庵。由此可見，當時人們的自製箋紙不僅限于本人使用，也常用來饋贈親友，以供賞玩或寫信之用。

這批手札首先反映出二張在當年交往的頻繁和密切程度。第五十八通：「昨夜惺惺，不能深談，尚有要義未盡，請即枉過。」《潤于日記》中對兩人之間頻繁的會面也有詳細的記載。三十六札說「張家口熏肉信是香美。感謝，感謝！但不免如審配所云但恨少耳」，語氣直截了當，無所避忌；第二十七札則是臨時有事外出，要求繩庵代筆草擬謝恩札。在對方書齋中見到合用的羊毫毛筆也毫不客氣地

索要（十四、十五札）等等。所有這些，都是關係至為密切的好友才可能作出的行為。

其次，這批信札反映了二張在公事之餘的日常活動狀況，有助於我們瞭解當年京官們的一些業餘生活。

在這六十二通書札當中，雖多寥寥數語，涉及的內容卻頗多。其中偶有涉及朝政者，但其言詞隱晦，而且特意注明「丙」字。可見兩人在平時上疏議論朝政儘管是慷慨陳詞，而在私下的書信往來中則慎於談論政事。另有一些信札僅是邀請對方到家中商談的，其談話的具體內容也就不得而知。因此，就整批信札的內容而論，最可玩味的當為結伴清遊之事。清遊當然離不名勝古跡，但多數情況下是遊廠肆選購、賞鑒書畫、文獻以及閑遊遣悶。

自清代中葉起，位於和平門外的琉璃廠一帶成為了京城書店、字畫、古玩和文具等行業聚集之地，吸引了大量文人墨客、達官貴人來此賞玩、選購。同光之間其風尤盛。而香濤、繩庵兩人也不例外。香濤本人喜歡搜購文玩，既有風氣使然的因素，也有其個人的愛好和修養等原因。在此之前，他曾經為潘祖蔭整理考證過一批金石文字，其中雖不免訛舛，但仍顯示出他在這方面具有相當的功力。在四川期間他曾收集有關碑刻拓片；就連在晉撫任上還曾函托遠在北京的王懿榮「過市時代求有風趣物事數品，以娛勞人新年，破書棄扇皆好」（光緒九年十二月與王廉生書）。因此，他經常約繩庵同遊搜購書畫碑帖之類文玩，實屬順理成章。何況此時他訪求的書畫、文獻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為了充實鄉祠的收藏。

在這批手札當中，有相當部分所記述的內容就是兩人相約前往琉璃廠搜購古玩、書畫、文獻以及交流鑒賞心得。當時的琉璃廠已經是京師文物淵藪之地，吸引着無數的文人墨客、古玩捐客。叶德輝《都門書肆之變遷》記光緒年間士大夫遊琉璃廠的盛況：「吾官京曹時，士大夫猶有乾嘉餘韻，每於退值或休務日，群集於廠肆，至日斜，各挾數破帙，驅車而歸。」香濤這批信札中正好為這一記載提供了實物佐證。在諸札中，香濤不但對遊覽線路和時間均有所安排，而且還提及很多店鋪名稱，是研究清代晚期琉璃廠店鋪的珍貴史料。

其中有名可查的就有清秘閣、尊漢閣、隸古齋、永寶齋、翰文齋、博古齋、寶珍齋、澄秋閣等等，包括書肆、南紙店、法帖鋪、古玩店。其中清秘閣更是琉璃廠最負盛名的南紙店之一，其主顧主要是各種官員。從諸札內容可知，他們所選購的主要是一些書畫、古籍、金石拓片等。其逛遊方式既有獨自遊逛，也有結伴而行。而且其密度頗大，如從第三十五、三十八等札可看出都是連續兩天前往。而據《澗于日記》記載，己卯年正月十二至十五日兩人連續三天偕同其他好友遊廠肆，緊接着的十六日，兩人又有廠肆之遊。在這批信札中，一同遊廠肆最多的朋友是黃國瑾（再同、公瑕，貴州貴筑人，是當時蓮池書院山長黃彭年之子，官至翰林院編修），而在繆荃孫所追記當年「日日來廠」的舊友中，再同就是其中之一。信中也記錄了其中的喜和憂。如第四十札：「獨遊至暮，止得青主草書一幅。然

卻有一快事，頓悟去騰所得有押字無姓名手卷乃王守溪也。為之狂喜。『第三十札體現的是另一種心情：『石文介兄弟手札始終不肯携來，令人鬱鬱不快。廟市行且畢矣，而趙忠毅遺墨竟不可見，亦是大闕陷事。吾誠豈竟不能感格鬼神乎？終當求之。』此外，第五十一通有『明日仍擬遊廠，到泰豐樓早飯』之語，所提及的泰豐樓則為舊時北京飯莊中著名的『八大樓』之一，開業於咸豐年間，屬山東風味，其位置也在城南，與廠甸相去並不遠，在當時已經是聞名遐邇的飯莊了。

這批信札的內容表明，香濤從琉璃廠購買的物品主要為書畫碑帖和畿輔地方文獻。除了像上述那樣親自到廠肆搜訪之外，也有從直接上門推銷的古董商那裡得到的。如第五十八、五十九兩札，分別稱『早起寂坐齋中，而得吾鄉兩先輩扇，亦一奇也』、『朝旦獨坐，俄頃之間已得鄉先生兩書一扇，殆有合於老氏不出戶牖而知天道之妙』。可見古玩商們已掌握其喜好，專門迎合其口味有目的地上門供貨。這種送貨上門的做法在舊時琉璃廠古玩商中頗為盛行，其對象主要是一些大客戶或老主顧。在當時，潘祖蔭、翁同龢等人就屬於這類主顧，他們『尚候廠友之自送，罕見蒞肆』（繆荃孫《琉璃廠書肆後記》）。由此說明香濤在當時的古玩收藏界已有一定名氣。

收藏家得到心頭之好，必定會加以考證、鑒賞，與同好分享心得；此外，彼此有時也會交流一些藏品。這些都在此批信札中有所反映。

事實上，除了遊逛廠肆之外，張之洞與琉璃廠還有一層比較特別的關係。雲間顧公在《紀京城書肆之沿革》一文中說到：『清自咸豐庚申以後，人家舊書，多散出市上，人無買者，故直極賤；宋槧亦多。同治初元以後乃漸貴，然收者終少。至光緒初，承平已久，士夫以風雅相尚，書乃大貴。於時南皮張文襄方任四川學政，有書目答問之作，學者按圖索驥，賈人飾櫝賣珠，於是紙貴洛陽，聲蜚日下，士夫踪跡半在海王村矣。』可見南皮於琉璃廠是時之興盛其功不淺。而這批信札的內容正好也印證了『士夫踪跡半在海王村』的熱鬧情形。

遊逛廠肆之外，這批信札比較集中提到的是與二張家鄉直隸有關的事情。

香濤與繩庵均為直隸人，誼屬同鄉，因此，有關家鄉的事情自然是兩人日常交往中共同的重要話題和事項。修建畿輔先哲祠是其中較為重要的一項。畿輔先哲祠即札中所提及的鄉祠，位於下斜街，由張之洞與李鴻藻等人主持修建。鄉祠的建設顯然被香濤本人視為其生平一大功績。《抱冰堂弟子記》專門記其事：『在京與同鄉創建畿輔先哲祠，祀歷朝鄉賢，專收藏鄉賢書畫手跡。』其創建的時間，許同莘考證是光緒六年之事。但光緒五年的《澗于日記》即已談到此事。該年『八月十六日』條記：『同容舫至直隸會館一遊，故拙政園也。張子青先生撫吳時率鄉人割倖建，長康司事。今已漸形荒落。在都時與李蘭蓀師、張孝達前輩方營畿輔先賢祠，當作書告之，務

慎選司館之人，以此為鑒也。」明確指出在其未離開京城之時先哲祠已在營建。據《年譜》記載，鄉祠的倡建者為李鴻藻和香濤兩人，而具體主持和負責者則是香濤，即《年譜》所說的「其規畫一切，則公主之」。諸札中，尚有數札談及收集畿輔先賢遺物者，其實也與先哲祠的建設有關。如第六札提到之趙南星鐵如意即有拓本藏於祠中的「如意齋」。上述這些資料表明，張佩綸也參與了先哲祠的創建，而於祠中先賢文獻的收集尤為用力。許同莘曾見香濤致繩庵一批信札，其中與先哲祠有關者頗多，並「屢言購先賢書畫事」（《張文襄公年譜》卷一）。可居室所藏這批信札從內容來看似與許同莘所見者有關，或係其佚出者。畿輔先哲祠曾藏有大量畿輔先賢的遺墨、遺物，其中當有不少經二張之手收進，其中很可能就有這批信札中所提及的物品。

編纂《畿輔先哲錄》則是二張為家鄉所作的一項鮮為人知的事情。前述第五札顯示，兩人相約於己卯年十月二十日見面討論此書的編寫。而據《澗于日記》記載，此後兩天，兩人繼續商談此事：廿一日「過孝達，輯先哲錄」；廿二日「香濤訂修畿輔先哲錄」。這項工作直至十二月十九日完成：「畿輔先哲錄成。此一月中，余心力疲乏極矣。天亦時有雪霰，為十餘年所罕見。」在繩庵的日記中，從十一月二十三日至十二月十八日這近一個月的時間里，除十二月初五（「墓志寫定」）、十二（「恪靖寄百金為賻，作書卻之」）這兩天之外，日記中其餘日子均未記錄任何事情，可見此時張佩綸主要是埋首於此書之編纂。直到庚辰年二月初二日，繩庵夜宿通州李問樵家時，還曾談及同人輯《畿輔先哲錄》，並向李索其弟李載文傳略寄香濤以資考證。

從這批信札和前引《澗于日記》的相關記載來看，《畿輔先哲錄》可能由香濤倡議，而由繩庵負責具體的文字工作。據前引的日記資料，可知該書歷時不足一月即已完成，其後續有修訂。二張所編此書未見流傳和其它著錄，或係編迄而未付手民者，其內容和篇幅也因此無從稽考。此後徐世昌曾編《大清畿輔先哲傳》，不知與二張所纂此書可有淵源。

要之，這批信札提供了清流時期二張交往的詳細而可靠的重要資料，見證兩人之間密切的關係，有利於瞭解他們公事之餘的日常活動狀況。我們日常在談及這些重要歷史人物時，往往只會聯想到他們在廟堂之上為國家朝廷大事慷慨激越、侃侃高談的形象，而容易忽略其日常的一些私人活動。而這些信札所提供的信息，正好生動而具體地描繪出他們在現實生活中作為普通人的另一側面，從而使我們對其真實生活有更全面的掌握，歷史人物的形象也由此變得更為立體而可信。

三

光緒七年底，張之洞再次離京，出任山西巡撫。這時，二張几乎没有見面的機會，但彼此仍保持着密切的聯繫，書信往來頻密。這

由《張之洞全集》所收二十通致張佩綸的信札可見一斑。光緒八年四月二十日，孝達在晉撫任上所上的《肅舉賢才摺》中，所薦舉的第一人即是黃齋，并稱其「內行純美，秉性忠貞，清鯁不阿，能謀能斷，誠摯可以共艱危，警敏可以應急變，內政外事皆所優為，論其志節才略，實為當代人才第一」。而在馬江之戰中，香濤還曾派廣東的兵馬馳援繩庵。

二張同為直隸老鄉，同樣出身文學侍從，負高才，有志略，堪稱志同道合，而張佩綸的天資以及清流時期的風頭甚至超過了張之洞。但命運弄人，其後二人的仕途卻是大相徑庭：香濤由京城外放巡撫后仕途順暢，一路得意，而繩庵則「豐才膏遇」，命運多舛，令人惋惜。

二人後來在仕途上為何有此截然不同的際遇，個中原因極為複雜，非本文所能說清。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中法戰爭是兩人事業和命運的重要轉折點：繩庵因馬江之戰失利而遭謫戍邊，事業由此急轉直下，命運坎坷；而香濤則因此顯示出其協調能力與軍事才能，此後屢膺疆寄，最終入參機要，砥柱中流，成為一代名臣。

中法戰爭同時又是二人交往的轉折點。兩人自此音問漸稀，其關係也漸趨疏遠。在繩庵遣戍軍台期間，兩人曾有過為數不多的書信往來，香濤也曾向繩庵饋贈金錢和廣東的刻書、特產等。但與其他前輩、朋友如李鴻藻、王懿榮、黃國瑾等書問不斷的情況相比，二張之間的書信往來確實稀少。但另一方面，兩人仍互相牽挂。通過《潤子日記》，可知繩庵一直非常留意廣雅的重要舉動。同樣，香濤也繫念着繩庵。曾見拍賣會上有一套《咸同光板蕩權臣大吏遺墨》冊頁所收香濤信札中，香濤就頗為關注繩庵在塞下的窘苦狀況，並詢問「幼樵明年可望賜環否」（見中安太平國際拍賣有限公司二〇〇七年秋季藝術品拍賣會古籍文獻專場圖錄六五八號）。平心而論，二人的日漸疏遠並非如某些研究者所說的那樣應該全部歸咎於香濤。事實上，繩庵自己似乎在有意無意之間疏離了香濤。如光緒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繩庵「得安圃書，又孝達寄三百金」，但他遲至三月十三日才「復香濤書」，這對於繩庵來說是比較少見的。在當時，對於其他友朋的來信，他都是儘快回復的。同年七月十八日「得安圃及再同書，再同復寄孝達書及龍眼、荔枝來」，而日記中則未見到有回復香濤的記錄。另一方面，與此同時，繩庵與李鴻章之間的書信來往卻甚為頻密，李在信中多次論及香濤的兩廣的一些做法，又曾經命人前往探望繩庵。繩庵釋還後立即入李鴻章幕，二張的關係就更為疏遠。光緒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李鴻章因與張之洞就鐵廠借款事相持不下，遂利用繩庵的關係，「從中通之」。繩庵在當天的日記中說道：「五年來先施於厚祿故人者惟此而已，然究無謂也。」從中可窺見繩庵對香濤態度的某些變化。這也許可以有助於解開兩人關係疏遠之謎。

其實，在後期，二張兩人之間仍保持一定形式的聯繫。可居室藏札中有一通梁鼎芬信，是向壺公（張之洞）彙報繩庵家人的有關近

況的。而在黃國瑾病篤時，繩庵「伴之赴滬，並電請香帥派員弁接替」。而他沒有直接將黃送到湖北的原因是「畏到鄂應酬」，由此或多或少可以窺見他的某種心態。（《張佩綸致朱潛書札》第一通，《歷史文獻》第十三輯）

繩庵晚年定居金陵，香濤則兩度署理兩江總督，按理兩人在此期間晤面的機會應該較多，但事實卻不然。此時的繩庵對香濤這位想登門相見的早日密友有意避而不見。所幸在繩庵去世前不久，兩人終於見上了一次面。

陳寶琛撰《張蕡齋學士墓志銘》中記述了蕡齋去世前兩人的這次會面：「南皮相國相睽近二十年，來權江督。欲見，輒以疾辭。偵少間，以歲除日就君縱談身世，累欷不已。既而歎曰：「不得為廉生，命矣！」廉生，王文敏字，盡室殉庚子之難者也。疾遂革，以癸卯正月七日卒，年五十有六。」由此記載可知此次會面為蕡齋逝前數日之事。這是兩人近二十年來第一次也是最後的一次見面，時過境遷，故友飄零，難怪會「累欷不已」。

不知這次見面，令兩人「累欷不已」的往事中可有包括二十四年前兩人與張人駿對雪圍爐、削鹿脯下酒的那個除夕夜。我想，他們會憶及的。今天，當想起這前後相隔二十四年、情景迥異的兩個除夕，品讀着這批信札，雖然時隔百餘年，我們仍是唏噓不已。

主要參考文獻：

-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版
苑書義等主編《張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八月版
張佩綸撰《澗于日記》，一九六六年台灣學生書局據民國豐潤張氏澗于草堂石印本影印
許同莘編《張文襄公年譜》，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明清藏書家年譜》影印本
孫殿起輯《琉璃廠小記》，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九月版
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所編《歷史文獻》第九—十三輯，上海古籍出版社

再曰在也
遇我共談遣
繩金仁兄
期前



松茂製

再同在座^①，過我共談遺悶，何如？繩盒仁兄^②。期之洞頓首^③。

① 再同，即黃國瑾。黃國瑾（一八四九—一八九〇），字再同，號公瑕，清貴州貴筑（今貴州省貴陽市）人，張之洞、張佩綸密友。光緒二年（一八七六）進士。嗜學能文，精考證，善書法。

② 繩盒，即張佩綸。張佩綸（一八四八—一九〇三），字幼樵，又字繩盒，號黃齋，清直隸豐潤（今河北省唐山市豐潤區）人。同治十年（一八七二）進士。光緒元年（一八七五）以編修擢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八年（一八八二）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中法戰爭（一八八三—一八八五）中受命會辦福建海疆事宜，兼署船政大臣。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在馬江之役中指揮失當，福建水師覆滅，馬尾船廠被毀，次年被褫職遣戍察哈爾。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獲釋，入李鴻章幕，並娶其小女鞠耦為繼室。中日甲午戰爭（一八九四—一八九五）期間遷居南京，八國聯軍侵佔北京後，曾北上佐辦和議，因與李鴻章意見相左，旋返南京，自此稱病不出。其學問淵博，才思敏捷，著有《澗于集》、《澗于日記》、《管子學》等。張之洞與之訂交於同治末年。光緒初年，兩人一同成為「清流黨」的健將，交往愈密。

③ 期，即期服，喪服制度之一。此時張之洞應是為第三任夫人服齊衰杖期。諸札後附無款題記一開：「廣雅都門辰巳來簡，己卯年亦附詩二首在內。」為收信人語氣，其筆跡特徵與《澗于日記》以及其他具名手札一致，當為張佩綸所書。辰、巳為庚辰、辛巳之省稱，即光緒六年（一八八〇）、七年（一八八一），據此可知諸札寫作時間大體為此二年。張之洞第一任夫人為貴州都勻知府石煦之女，同治四年（一八六五）五月病卒；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其繼娶湖北按察使唐樹義之女，兩年後唐夫人卒；第三任夫人為四川龍安知府王祖源之女，亦即其好友、著名金石學家王懿榮之妹。光緒五年（一八七九），王夫人辭世，關於其辭世之具體時間，許同莘《張文襄公年譜》繫諸是年二月，而據張佩綸《澗于日記》，王夫人辭世時間乃是年九月。日記載，己卯年（一八七九）四月初六日，生母毛太恭人去世，百日之後扶灵回原籍安葬，九月二十八日甫返北京，「聞香濤繼室亦以婉逝，走慰之」，十一月初三日「晨起，往奠張孝達繼室王恭人于龍樹寺」；十一月十五日，「夜至龍樹寺，詣孝達，談其夫人盡七也」。十一月十五日上距九月二十八日，剛好接近盡七之期。日記所記去世時間和原因較為明確，而《年譜》則是「詳于撫晉以後，先乎此者不得而詳」，故當以日記為準。因此，諸札中帶「期」字者當為光緒五年九月下旬之後一年內所寫。

